

辜鸿铭、杜亚泉、梁漱溟中西文化观比较

周良发

(安徽大学 哲学系,安徽 合肥 230039)

摘要:面对20世纪初中华民族面对的民族和文化的多重危机、以辜鸿铭、杜亚泉、梁漱溟为代表的文化保守主义以复兴传统文化、振兴民族精神为使命,对中西文化进行了深刻且详尽的分析。辜鸿铭的“道德力”高扬了中国人的精神,杜亚泉认为中西文化之异即动静之别,梁漱溟以“意欲”为基点,把文化分成西洋、中国、印度3种模式。在以上分析的基础上,他们各自提出自己的独特见解:在文化的发展程度上,辜鸿铭与梁漱溟认为东方文化是成熟的文化,而西方文化尚未成熟;在文化的性质上,辜鸿铭、杜亚泉、梁漱溟认为中国文化重义,西方文化重利;在儒学的宗教性上,辜鸿铭与梁漱溟认为,儒学似宗教非宗教;在文化的未来走向上,辜鸿铭主张中西融合,杜亚泉主张中西调和,梁漱溟主张中国文化复兴论。他们对中西文化的独特见解,对当下如何看待中西文化仍可引为借鉴。

关键词:辜鸿铭;杜亚泉;梁漱溟;中西文化观

中图分类号:G0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6248(2011)01-0109-06

辜鸿铭、杜亚泉、梁漱溟是中国现代思想史上具有重要影响的人物。在西风劲吹、传统文化受到强烈冲击日显衰落之时,他们应声而起,力拒西化潮流,致力于传统文化的现代复兴。在他们看来,要解决社会危机,只能到传统文化中寻找救世良方。学界对辜鸿铭、杜亚泉、梁漱溟思想的研究论著可谓汗牛充栋,然而对他们的中西文化观进行系统比较的研究论文尚未问世。笔者认为,深入比较他们的中西文化观,可以更好地厘清那个时代知识分子对危机四伏的中国的忧患之思。

一、辜鸿铭、杜亚泉、梁漱溟 中西文化观之要旨

作为文化保守主义,辜鸿铭、杜亚泉、梁漱溟都

感受到社会道德的普遍缺失,西学东渐之后的人心不古。他们基于共同的文化立场,为了复兴传统文化,在中西文化观上提出各自不同的理论。辜鸿铭的“道德力”高扬了中国人的精神,杜亚泉认为中西文化之异即动静之别,梁漱溟以“意欲”为基点,把人类文化分成西洋、中国、印度3种模式。

(一) 辜鸿铭的“道德力”

正值传统文化日趋没落、民族精神受到践踏之时,辜鸿铭站了出来。他以欧洲文明为根基审视中国文化,以儒者的内在使命感向西方宣扬儒家传统。他对中西文明的比较,不注重其物质层面,只注重深入分析其精神特质。他说:“要估价一个文明,我们必须问的问题是,它能够产生什么样子的人,什么样的男人和女人。事实上,一种文明所生产的男人和女人——人的类型,正好显示出该文明的本质和个

收稿日期:2010-09-26

基金项目:安徽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AHSK09-10D151)

作者简介:周良发(1979-),男,安徽六安人,哲学博士研究生。

性,也即显示出该文明的灵魂。”^[1]在辜鸿铭看来,文明优劣的标准不在单纯的物质,而应该看这种文明的精神价值。辜鸿铭正是以中国人、中国妇女和中国语言为主题,揭示中国文明的真正价值,这是西方文明所不能与之媲美的;中国人的深沉、博大、纯朴与灵敏也是西方人所缺少的。

辜鸿铭在中西文明比较中,强调了中国文化、中国人的精神。他说:“中国人的精神是一种心灵状态、一种心灵趋向”;“是一种永葆青春的精神,是不朽的民族魂”。而“民族不朽的秘密就是中国人心灵与理智的完美和谐”^[1]。辜鸿铭为了突出中国文化与中国人的精神的优越性而过多地批判了物质文明。但是深谙西方文明的他,并不完全因循传统文化,而是一个中西文化融合论者。他说:“我既不是攘夷论者,也不是那种排外思想家。我是希望东西方的长处结合在一起,从而消除东西方界线。”^[1]他对中西文化差异的分析,目的在于强调中西方文化的统整与融合。

(二) 杜亚泉的“动静观”

新文化运动期间,杜亚泉以《东方杂志》为阵地,发表了一系列关于中西文化问题的文章。他的深思熟虑、稳健持重与主张社会变革的激进思潮相比,显然被认为是保守主义。他主张中西文化调和,与新文化派展开过激烈的论争,反对其对传统文化的过激行为。

杜亚泉对中西文明的论述是从中西社会文明结构以及相互关系开始的:“西洋文明与吾国文明之差异,即由于西洋社会与吾国社会之差异”。他认为由于东西方社会成立的历史条件不同、所处的地理环境不同,才会造成中西社会的诸多差异:西洋社会“注重人为”、“生活为外向的”;吾国社会“注重于自然”、“生活为向内的”。西洋社会好竞争,以“战争为常态,和平其变态”;吾国社会重道德,“和平其常态,战争其变态也”。中西社会的差异“皆为竞争存在,自然存在,两观念差异之结果”。由此,他认为:“西洋社会,为动的社会,我国社会,为静的社会;由动的社会,发生动的文明,由静的社会,发生静的文明。”^[2]“动”与“静”各有长短,西洋文明与中国文明没有绝对的优劣之别。

杜亚泉提出“动静观”之目的在于:“盖吾人意见,以为西洋文明与吾国固有之文明,乃性质之异,而非程度之差;而吾国固有之文明,正足以救西洋文明之弊,济西洋文明之穷者。”^[2]中西文化只有民族

的差异、地域的差异,否认两种文化反映了社会制度和社会发展阶段的差异。“至于今日,两社会之交通,日益繁盛,两文明互相接近,故抱合调和,为势所必至。”^[2]杜亚泉中西文明调和的实质是以中国固有文明去融合西洋文明,光大中国传统文明的现代价值,以增强民族自信心。

(三) 梁漱溟的“意欲论”

梁漱溟是中国现代思想史上第一个从学理层面剖析中西文化的思想家。他对中国现代化与儒家传统之间的毕生求索,表征着知识分子的世纪之惑和中西文化的艰难抉择。他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第一次把中国文化纳入世界文化版图加以平等的论定。梁漱溟认为西洋、中国、印度三大文化系统是源于人类生存“意欲”的不同,才表现为不同的文化路向。意欲,是梁漱溟哲学的核心概念。它源于柏格森的生命哲学,吸收佛教唯识宗阿赖耶识之精华,归于阳明学之良知。

梁漱溟认为文化是“一个民族生活的样法”,“生活就是没尽的意欲和那不断的满足与不满足”^[3]。他以“意欲”为根本,论证西、中、印三大文化系统的不同路向:“以意欲向前要求为其根本精神”的西洋文化;“以意欲自为、调和、持中为其根本精神”的中国文化;“以意欲反身向后要求为其基本精神”的印度文化。他认为人类文化应该沿着他设计的3个阶段递进:西洋文化从第一路向开始,现在已发展到第二路向,即中国文化时代;中国文化本应走第一路向,却折入第二路向,印度文化没走完第一、第二路向,直接步入第三路向。他以“意欲”为根本,建构了自己独特的文化哲学。虽然这一哲学体系略显粗糙,但毕竟是现代意义上的第一个完整的体系,是世纪之初国人回应西方强势文化挑战所创造的最具哲学色彩的体系。“意欲”论不仅确立了梁漱溟在中国现代哲学史上地位,也使他成为现代新儒学开山祖师,被誉为20世纪传统文化试图重建的精神象征。

二、辜鸿铭、杜亚泉、梁漱溟中西文化观之价值取向和学理特色

辜鸿铭、杜亚泉、梁漱溟并不是同一时代的人,他们彼此的人生经历和教育背景亦有很大差别。然而,作为活跃于“五四”前后的文化保守主义者,他们对中西文化有着基本一致的价值取向和学理特色。

(一)在文化的发展程度上,辜鸿铭与梁漱溟认为,东方文化是成熟的文化,而西方文化尚未成熟

1. 辜鸿铭认为东方文明是成熟的文明

辜鸿铭在对中西文化差异的认识中谈到东方文化的早熟。辜鸿铭认为,西方文明是一种不成熟的文明,东方文明是一种成熟了的文明。他说:“东西文明有差异是理所当然的。从根本上说,东洋文明就像已经建成了的屋子那样,基础巩固,是成熟了的文明;而西洋文明则还是一个正在建筑当中尚未成形的屋子。它是一种基础还不牢固的文明。”^[1]辜鸿铭以屋子为喻论证中西文明之差异,他认为中西文明差异的根源应在此:“欧洲人没有真正的文明,因为真正的文明的标志是有正确的人生哲学,但欧洲人没有。”^[1]因为没有真正的人生哲学,辜鸿铭就断定西方文明是一种不成熟的文明。在中国,“道”是真正的人生哲学,“道”的内容就是教人怎样正当地生活,怎样过上人的生活。

2. 梁漱溟认为东方文化是早熟的文化

梁漱溟认为,东方文化早熟应归因于两大天才——孔子与释迦牟尼。正因为两大天才的出现,东方文化分别折入第二路向和第三路向。因此“照我们历次所说,我们东方文化本身都没有什么是非好坏可说。或什么不及西方之处;所有的不好不对,所有的不及人家之处,就在步骤凌乱,成熟太早,不合适宜。并非这态度不对,是这态度拿出太早不对,这是我们唯一致误所由”^[3]。据此,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东方文化不如西方文化。西方文化之所以发达,因为它走的第一路向是合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而东方文化不待走完第一路向,就提前折入第二、第三路向,自然是不合适宜的,是早产儿,是文化之早熟。

(二)在文化的性质上,辜鸿铭、杜亚泉与梁漱溟认为中国文化重义,而西方文化重利

1. 礼仪文明与物质文明

辜鸿铭早先接受的是西方文化,当他接触到中国文化时,就成为中国文化捍卫者。他认为西方文明是机械的物质文明,中国文明是礼仪文明。“常有人说,欧洲文明是物质文明,其实欧洲文明是比物质文明还要次一等的机械文明。虽然,罗马时代的文明是物质文明,但现在的欧洲文明则是纯粹的机械文明,而没有精神的东西。”^[1]在他看来,正是西

方近代以来的科技束缚了人自身才能的发展,人与人的关系是极其冷漠的金钱关系。中国文明则是一种“王道文明”,中国社会结构是建立在“道德力”基础之上的。

西方文明讲究斗争和利益的文明,存在心灵与理智的冲突,且这种冲突是永恒存在的;中国文明却是心灵与理智的二者合一。“欧洲文化成了瓜分利益的战场,成了以瓜分科学与艺术的一方,以瓜分宗教和哲学的利益为别一方的连绵不断的战争,实际上成了头脑与心灵—灵魂与理智—不断冲突的可怕战场。在中国文化中,至少在过去的两千四百年时间里并不存在这种冲突。我认为,这就是中国文化与现代欧洲文化的一个重要区别。”^[1]至此,辜鸿铭的中西价值观可概括为“中义西利”:“我国之文明与欧洲文明异,欧洲之文明及其学说,在使人先利而后义;中国之文明及其学说,在使人先义而后利”^[1]。西方社会一切弊端的产生都归因于对物质与名利的追逐,他对孔子的“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大加赞赏,把“以小人之道谋国,虽强不久;以君子之道治国,虽弱不亡”^[1]奉为治国之纲。作为中国文明的守护者,辜鸿铭把儒家文化视为中国文明的精神支柱。因此,可以救中国者,只有传统文化,而要恢复传统文化,人人都必须做“真正的中国人”。要成为真正的中国人,必须求诸于孔孟之道。

2. 静的文明与动的文明

在中西文明比较中,杜亚泉认为中国文明重在个人的内心修养和道德礼仪,而西方文明关注物质利益与生存竞争。西方社会把竞争胜利作为生存的必要条件,尊重个人行为,获得财产乃正常之事;中国文明则消灭竞争、注重道德,把与世无争、与人无争作为生存原则。“西洋社会,既以竞争胜利为生存必要之条件,故视胜利为最重,而道德次之;且其道德之作用,在巩固团体内之各分子,以对抗他团体,仍持为竞争之具。而所谓道德者,乃从人与人之关系间,规定其行为之标准,故多注意于公德,而于个人之行为,则放任自由,凡图谋自己之利益,主张自己之权利,享用自己之财产,皆视为正常,而不能加以非难,资本家之跋扈于社会,盖由于此。”^[2]西洋社会以竞争、物质为生存的必要条件,为解决争端而发动战争属于正常现象,而和平则是战争后的休养时期。在他看来,在西洋社会,物质利益比道德律令更为重要。

杜亚泉认为中国文明与此截然不同:“我国社

会,则往往视胜利为道德之障害,故道德上不但不崇拜胜利,而且有蔑视胜利之倾向,道德之作用,在于消灭竞争,而以与世无争,与物无竞,为道德之最高尚者。所谓道德,即在拘束身心,清心寡欲,戒谨于不睹不闻之地,为己而不为人,故于个人私德上兢兢注意,凡孜孜于图谋自己利益,汲汲于主张自己权利,及享用过于奢侈者,皆为道德所不许。”^[2]由此可见,中国人向来顺应自然、与自然为善,能够做到与物无竞、淡泊利益,更不会发生冲动。

3. 道德文明与物质文明

在中西文化的定性上,梁漱溟比辜鸿铭、杜亚泉显得复杂与谨慎。他既承认西方文化特色是科学与民主,又重步保守主义的老调,认为西方文化是物质文明。在他看来,社会的进步,不在科技的发展,不在个体理智的进化,也不在物质之丰富。他说,西方人“以为圆满了物质生活就圆满了人生;但要经济情况如他们的理想,得到了改善,人类就得到了丰美的生活,就成了黄金世界……误以为生活的丰美在于被动的享受上,其实生活的丰美满足只能得之于内,不能得之于外的”^[3]。他认为不能以生产是否进步、物质是否丰富来评价一个社会是否进步,这个标准只能是主观上的。主观感情上的满足和丰富才是社会发展的终极标准,而这种理想社会便是梁漱溟认定的“伦理本位”的社会。伦理本位的社会,也就是说整个社会都是从家庭伦理关系出发,在彼此关系中以对方为重。这样人与人之间的相与之情,在社会关系中各方只考虑自己所应尽的义务,而不是想着自己的权利。这种相与之情所形成的伦理道德,使所有的社会问题都得到解决。而在社会发展上,中国人偏重个人伦理道德的培养,忽视了对物质利益的追求。

(三) 在儒学的宗教性上,辜鸿铭与梁漱溟认为儒学似宗教非宗教

辜鸿铭以为,儒学是君子之道,是良民宗教;梁漱溟则认为周孔教化并非宗教,中国三千年文化是以“道德代宗教”,以伦理道德组织社会。

1. 儒学是良民宗教

在辜鸿铭看来,在欧洲,正是宗教拯救了人的心。历史上,基督教曾有效地征服和控制了人们的欲望。可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表明,基督教作为有效的束缚力量已然失去了效用。在这种情况下,欧洲人何处寻找新的道德力量呢?辜鸿铭认为,欧洲人会在中国文明里找到它——良民宗教。辜鸿

铭的良民宗教并非欧洲人心中的宗教。他说,良民宗教的首要原则就是相信人性本善;相信善的力量;相信爱和正义的力量与效用。爱与正义是一种高于物质力的道德力或道德责任感,这是每个中国人必须服从的,这种服从远强于宗教的外在束缚。简言之,辜鸿铭的良民宗教是一种伦理、一种内在道德。

辜鸿铭认为,与欧洲相比,良民宗教是一种不需教士和军警就能维持秩序的宗教。这个不比欧洲大陆人口少的中国人,没有教士和军警,却始终秩序井然。当然辜鸿铭也没有彻底否定军警和教士的作用,只是这种作用在中国是微不足道的。在辜鸿铭看来,值此欧洲文明濒临破产的关头,拥有良民宗教的中国人才是拯救欧洲文明的途径。他甚至说“来改变欧美式的人,将欧美人变作不需要教士和兵警便能就身秩序的真正的中国人,那么可以预料,世界将为此而摆脱一种多么深重的负担”^[1]。

2. 儒学是道德宗教

关于儒学是不是宗教,是中国近现代以来思想界争论最大的问题之一。梁漱溟认为,儒学似宗教而非宗教,维系中国社会秩序稳定的是儒家伦理道德并非宗教。儒学之所以能够代替宗教,就在于儒学虽不是宗教却具有宗教的某些特质。

梁漱溟指出,人类文化都是以宗教为开端的,道德、礼俗、法律都孕育于宗教之中。人类文化初期之所以需要宗教,因为人类对于自然环境的一切都不明白,也不能控制,亦受其威胁,终日恐怖不安。中国亦无例外:在周孔教化未兴时,亦当为一种宗教;在周孔教化勃兴之后,文化中心便移到非宗教的周孔教化上。周孔以来的中国文化中有些显然属于宗教范畴,何以说它缺乏宗教,三千年的中国文化“几乎没有宗教的人生”?梁漱溟认为,孔子有一种精神为宗教所不具备的,这就是孔子相信人都有理性。他要启发众人的理性,要实现一个“生活完全理性化的社会”,且完全信赖人类自己“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什么事该做,什么事不该做,从理性上自然明白,养成自己的辨别力。这种存在于个人的自觉不是宗教,是道德。道德为理性之事,依赖个人的自我反省;宗教为信仰之事,寄于宗教的教规。他指出,中国自孔子以来,便受其影响,走上以道德代宗教、以伦理组织社会之路。源于此,中西方走向了不同的社会结构:周孔教化使中国社会渐进伦理本位的宗法社会;基督教使西方社会转向集团生活与个人本位。

(四) 在文化的未来走向上

新文化运动前后,中国文化的未来走向成为思想文化界争论与关注的焦点,全盘西化,或中西调和,还是中国文化超越西方文化?与新文化派和顽固守旧势力不同,辜鸿铭、杜亚泉、梁漱溟在此问题上显得异常清醒和理性,并有独到的见解。

1. 辜鸿铭的中西融合论

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捍卫者,辜鸿铭对中西文明差异的分析中,强调了中国文化的精神,强调中西文化的融合。关于中西文化怎样融合,他态度十分明确:西方文明要向中国文明学习,从中国文明中寻找出路。他说:“我相信,学习中国文化,学习中国书籍与文学,所有欧美人民都将大有裨益。”^[1]用中国文明拯救西方,拯救世界,在中国文明的推动下,世界文明终将走向大融合。此外,辜鸿铭以极大的热情把中国传统文化典籍用流畅的外文译介到欧美各国,在西方世界产生积极的文化效应,俨然成为一个“补救西方文明之弊”的救世主。他还试图证明中国文明的价值,“我想表明研究中国文明如何有助于解决当今世界面临的问题——如何将欧洲文明从崩溃中拯救出来”^[1]。正值传统文明遭受西方文化的侵袭,他弘扬了中国文化精神,力争与西方强势文化抗衡。

2. 杜亚泉的中西调和论

杜亚泉不承认中西文化是“程度之差”,而是“性质之异”,认为中西文明各具优点又各有缺陷,应该相互调和。他不反对输入西方文明,亦不主张丢弃中国固有文明。在他看来,“有保守而无进,则拘墟于旧业”,“有开进而无保守,使新旧间之接续,截然中断,则国家之基础,必为之动摇”,“故欲谋开进者,不可不善于接续”^[4]。杜亚泉反对激进的反传统,提倡中西文化上新旧调和。至于如何调和,他说“救济之道”在于:“尽力输入西洋学说,使其融合于吾固有文明之中。西洋之断片的文明,如满地散钱,以吾固有文明为绳索,一以贯之”^[5]。概言之,杜亚泉认为,未来文化是以中国文化为主,融入西方文化的新文化。

3. 梁漱溟的中国文化复兴论

梁漱溟认为继西方文化的繁荣之后,将依次出现中国文化和印度文化的复兴。“质而言之,世界未来文化就是中国文化的复兴……尤其是第一路向走完,第二问题移进,不适宜的中国态度遂达其真必要之会,于是照样也拣择批评的重新把中国人态度拿出来。……而最近未来文化之兴,实足以引进

了第三问题,所以中国化复兴之后将继之以印度化的复兴。于是古文明之希腊、中国、印度三派意于三期间次等重现一遭。”^[3]当务之急,必须把中国人的态度拿出来:“第一,排斥印度的态度,丝毫不能容留;第二,对于西方文化是全盘承受,而根本改过,就是对其态度要改一改;第三,批评的把中国原来态度重新拿出来。”^[3]至此,梁漱溟深信这是人类文化发展的历史必然:世界未来文化就是中国文化的复兴。

三、结 语

学界把辜鸿铭、杜亚泉、梁漱溟定位为文化保守主义,但他们没有割断学术与社会现实的联系。他们关心国家的前途和民族的命运,并为挽救民族危亡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他们张扬传统以提升国人的民族意识,弘扬民族精神以培植国人的民族自觉,阐释传统文化的普世价值以复兴中国文化。纵观他们的中西文化观可以清晰地发现,他们维护和宣扬本民族固有文化的恒常价值,目的在于重塑失落已久的自强不息、奋发图强的“国魂”以挽救处于危亡之境的中华民族。

然而现在看来,他们的中西文化观亦存在不足。他们无限夸大了文化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把文化的革新置于社会政治、经济改革之上。因而,他们的思想在现实问题面前往往显得异常空洞与无力。此外,他们在中西文化比较研究过程中依然没能摆脱“中体西用”的窠臼。由于过多地表现出对传统文化的眷念之情,他们强调了文化的民族性,却忽视了文化的时代性。

但是,辜鸿铭、杜亚泉、梁漱溟在中国现代思想史上的地位不容置疑。在民族生死存亡、局势动荡不安的年代,他们的文化观为中国文化的现代化提供了一条可以参考的理论方略。他们对中西文化的深沉之思,对当下如何看待中西文化仍可引为借鉴。

参考文献:

- [1] 辜鸿铭,黄兴涛.辜鸿铭文集:下[M].海口:海南出版社,1996.
- [2] 杜亚泉.动的文明与静的文明[J].东方杂志,1916(13):1-8.
- [3] 梁漱溟.梁漱溟全集:第1卷[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
- [4] 杜亚泉.接续主义[J].东方杂志,1914(11):1-4.
- [5] 杜亚泉.迷乱之现代人心[J].东方杂志,1918(15):1-7.

Comparative study of GU Hong-ming, DU Ya-quan and LIANG Shu-ming on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e

ZHOU Liang-fa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Anhui University, Hefei 230039, Anhui, China)

Abstract: Facing the national and cultural crisis, GU Hong-ming, DU Ya-quan and LIANG Shu-ming analyzed the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e. GU's moral power displays the spirit of the Chinese people. DU takes the differences of the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e as the movement and static. As the starting point, LIANG divides culture into three models western, Chinese and India. For revival the traditional culture, they study deeply the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e. GU and LIANG think eastern culture is mature, but western is not; GU, DU and LIANG think Chinese culture lies righteousness, but western culture lies interest; GU and LIANG agree that Confucian is not religion; GU devotes integration of the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e, DU maintains reconcile of the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e, whereas LIANG believes revival of the Chinese culture in the future. Whatever their understanding of religion is, they are still our reference manual when we are dealing with the problem of culture.

Key words: GU Hong-ming; DU Ya-quan; LIANG Shu-ming;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e

(上接第 108 页)

DU of Jingzhao immigration lately to the south after Yongjia Riot

SONG Yan-mei

(School of Humanities, Changshu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Changshu 215500, Jiangsu,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studies the time and settlement in which two branches of DU in Jingzhao moved to the south, and researches their development path in the south. The study shows that the two branches of DU in Jingzhao immigrated lately to the south after LIU Yu seized Guanzhong. The view that DU Xun family crossed the river accompanying the emperor Yuan of Jin Dynasty is wrong. After they immigrated to the south, one branch resided in Pengcheng and Shouyang, the other resided in Xiangyang. The view that they both settled in Xiangyang is also wrong. Because they came to the south lately, they enliven separately in Song and Liang Dynasties, only relying on their military dedication. In the chaos caused by war at the end of Liang Dynasty, DU family encountered destruction.

Key words: Yongjia Riot; DU in Jingzhao; immigrate lately; the south